



第四章

殫精竭慮捍衛革命果實

一九一二——一九一九年





孫中山傳  
宋文翰題

## 第一節

# 致力於建設事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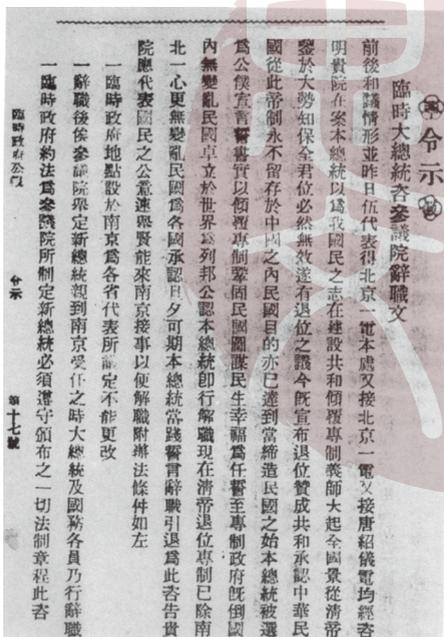
### 一、宣傳民生主義和實業救國

辛亥革命失敗後，反動的逆流重新氾濫起來。在袁世凱及其繼承者大大小小的軍閥統治下，中國的情況一天比一天黑暗，人們看不見中國的出路在哪裡。

面對這樣艱難的情況，孫

中山沒有後退，他以堅韌不拔的革命精神，繼續為謀求中國的自由平等而戰鬥，在鬥爭實踐中尋求救國真理。他領導了討伐南北封建軍閥的鬥爭，又經歷了一段艱難曲折、苦悶、失望和探索的漫長過程。

一九一二年四月一日，孫



鑒於清帝宣佈退位和袁世凱表示擁護共和，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三日，孫中山向臨時參議院遞交了辭呈。圖為《臨時大總統諮參議院辭呈文》（局部）。

中山辭去了臨時大總統一職的時候，他並沒有意識到革命已經遭到失敗，相反，還認為他所領導的革命已經取得了很大的勝利。在《南京參議院解職辭》

中，他說：「三月以來，南北統一，戰事告終，造成完全無缺之中華民國，此皆中國國民及全國軍人之力所致。在本大總統受職之初，亦不料有此種之好結

果。亦不料以極短之時期，而能建立如此之大事業。」<sup>1</sup>並充滿信心地認為：「在我們的前面，尚有大量的工作必須完成，俾使中國能以偉大強國的身分與列強並駕齊驅。」<sup>2</sup>因此，就想以在野之身，從事實業建設，使祖國臻於富強之境。他在一封覆章太炎的信中就明確指出：「文於國事，只知有役務，不知有權位，故於進退之際，行其當然，不假勉強。」<sup>3</sup>

孫中山表示「並非功成身退」，而要致力於社會改革，振興實業，發展社會經濟，「從中華民國國民之地位，與四萬萬國民協力造成中華民國之鞏固之基礎」。他放棄臨時總統的職



一九一二年四月一日，孫中山正式辭職。圖為一九一二年時的孫中山。

1 《孫中山全集》第二卷，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版，第三百一十七頁。

2 《致康德黎夫人函》，《孫中山全集》第二卷，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版，第二百三十一頁。

3 《覆章太炎函》，《孫中山全集》第二卷，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版，第一百二十一頁。

務，並沒有放棄為鞏固和建設共和國理想的鬥爭。

早在孫中山就任臨時總統之前，他就認為：「滿清時代權勢利祿之爭，吾人必久厭薄。此後社會當以工商實業為競點，為新中國開一新局面。」；「民生主義至今未少著手，今後之中國首須在此著力。」就在他解職的同一天，在南京同盟會會員為他舉行的餞別會上發表演說時，又向同盟會會員們明確表示：他的「解職不是不理事」，而是致力於「比政治緊要的」；「民生主義」事業，並提出了今後準備全力以赴的奮鬥目標。<sup>4</sup>這篇演說，是孫中山處在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開始時，經過深思熟慮後發表的帶有綱領性的講話。他在這一演說中，錯誤地認為民族、民權兩主義已「因清廷退位而付之實現」，「惟有民生主義尚未著手」，當前的要務是「社會革命」——實行民生主義。他重申社會革命的主要內容是「平均地權」，「若能將平均地權做到，那麼社會革命已成七八分了」。並再次比過去更為明確地闡述了「平均地權」的必要性和方法。此外，他還提出「借外債以興實業」和修築鐵路，與防止資本家壟斷的主張。認為「國家欲興大事業，而苦無資本，則不能不借外債」，「借外債以營不生產之事則有害，借外債以營生產之事則有利」。他對興辦實業充滿信心，認為「從前為清政府所制，欲開發則不能，今共和告成，措施自由，產業勃興，蓋可預卜。」<sup>5</sup>所以，他聲明將以民國國民的

4 《在南京同盟會會員餞別會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二卷，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版，第三百一十八—三百二十四頁。

5 《中國同盟會總理孫中山先生演說詞》，南京大總統府印鑄局年印本（參見《民主主義與社會革命》，載《孫中山選集》上卷，第一一四—一八九頁）。孫中山的這篇演說很重要，它的前半部分後被譯成法文，同年七月十一日載於比利時工人黨機關報——布魯塞

身分，在未來的歲月中，專門從事社會實業建設活動。

孫中山認為，民國初建，「國基未固，勢力衰微，是猶大病之後，不宜遽投劇劑」。<sup>6</sup>因此，孫中山讓權時就對袁世凱以「小康期之」，希望政局「無大故」，使民國逐步得到鞏固和進步。一九一二年八月間，孫中山去北京前致宋教仁的信，最能說明這時他的思想和主張：「民國大局，此時無論何人執政，皆不能大有設施。蓋內力日竭，外患日逼，斷非一時所能解決。若只從政治方面下手，必至日弄日紛，每況愈下而已。必先從根本下手，發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國勢不搖，而政治乃能活



一九一二年三月十日，拒絕孫中山提出立都南京的袁世凱（前排左三）在北京宣誓就職。

<sup>6</sup> 爾《人民報》(Lepeuple)；又被譯成英文，二月十三日載於紐約《獨立報》雜誌(The Independent)，題為《中國的下一步》(China's Next Step)；又被從法文轉譯成俄文，七月十五日載於俄國布爾什維克報紙《涅瓦明星報》第十七號，題為《中國革命的社會意義》。  
《涅瓦明星報》第十七號同時還發表了列寧的《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一文，對孫中山的這篇作品進行評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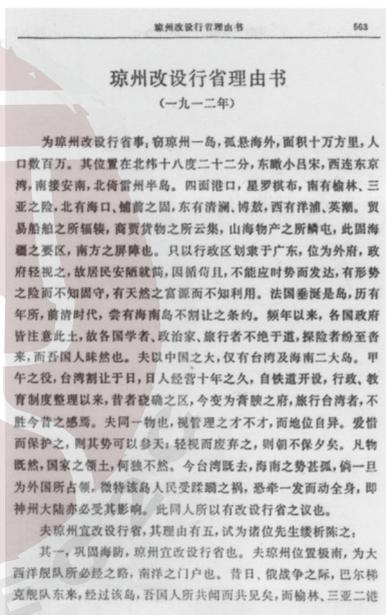
<sup>6</sup> 《孫中山全集》第二卷，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版，第四百八十六頁。

動。弟刻欲舍政事而專志於鐵路之建築。」<sup>7</sup>

正是為了這一目了然的，孫中山從解職總統後第三天，四月三日，就興致勃勃地開始周遊各省，進行有關民生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宣

傳活動。他率領胡漢民等人，從南京先赴上海，繼往武漢，再至福州、廣州，最後又去華北各地，走遍半個中國，到過許多城市和農村，進行調查訪問和參觀。他在大江南北、黃河上下、珠江口岸，走到哪裡都反復宣傳他的民生主義和「社會革命」的主張，以及建設國家的設想，闡述「平均地權」和興辦實業、發展鐵路及引進外資等政策問題，並提出一些在中國實現經濟大發展和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具體主張，希望中國能夠富強起來，趕上和超過歐美國家；同時號召軍民精誠團結，萬眾一心，建設新民國，使人民免除痛苦，得到幸福。

有人統計，孫中山在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初，共發表過五十八次講演，其中專講民生



一九一二年，孫中山等提出海南設省的構想，指出，「瓊州宜改設行省，其理由有五」，即「鞏固國防」、「啟發天然富源」、「文化政策」、「國內移民殖民政策」、「行政之便宜」。圖為《瓊州改設行省理由書》（局部）。

。451。

殫精竭慮捍衛革命果實  
第一節 致力於建設事業

主義或涉及這個問題的就有三十三次。<sup>8</sup>僅在一九一二年四月到該年年底九個月時間，孫中山在各地總共四十多次演講、談話中，有關民生主義、社會主義、實業建設等問題就不少於二十五次之多。正如孫中山同年七月中下旬接見紐約《獨立雜誌》特約代表李佳白(R. G. Reid)所表示的那樣，他當時正集中思想與精力，「從社會、實業與商務幾個方面重建我們的國家」，「希望看到人民大眾的生活狀況獲得改善，而不願幫助少數人增植他們的勢力，直至成為財閥」。<sup>9</sup>

當時，孫中山關於民生主義的演講，在國外激進人士中引起熱烈回應。他的演說部分內容被翻譯為法文，又由法文譯成俄文，



為節制袁世凱的權力，南京臨時政府決定袁世凱到南京擔任臨時大總統，為此組成以蔡元培、汪精衛為代表的南京臨時政府迎袁專使團。圖為迎袁專使團合影。前排左一汪精衛，左五蔡元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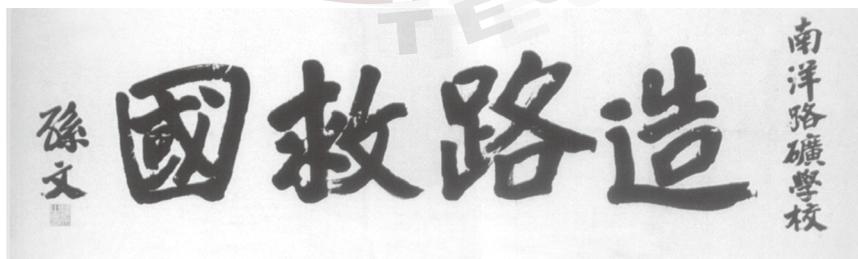
<sup>8</sup> 王德昭：《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分析研究》，載《中國現代史叢刊》第二冊，第二百零一頁。

<sup>9</sup> 孫中山：《中華民國》(The Chinese Republic)，紐約《獨立雜誌》一九一二年九月英文版。轉引自陳福霖：《美國〈獨立雜誌〉所刊孫中山先生的三篇著作》，《研究孫中山先生的史料和文學》，第三百三十二頁。

並分別載於同年七月十一日比利時工人黨機關報——布魯塞爾《人民報》和俄國布爾什維克報《涅瓦明星報》上。

同年四月中旬，孫中山在武昌各界民眾露天大會的演說中，還建議建造長江大橋或鑿通隧道，使武漢三鎮連成一片。他越來越認為，振興中國的唯一出路是發展實業，而建築鐵路則是「發展中國財源第一要策」，因為「實業之範圍甚廣，農工商礦，繁然待舉，而不能廢者，指不勝屈。然負之而可舉者，其作始為資本，助之而必成者，其歸結為交通」。但在交通中，若「無鐵道，轉運無術，工商皆廢」。「故交通為實業之母，鐵道又為交通之母。」<sup>10</sup>因此，他決定首先就要抓交通建設，特別是從修築鐵路入手，來實現社會革命的願望。

為完成這一設想，六月中旬，孫中山又專程去了上海，就這件事情同黃興討論和磋商，並且親自草擬了一份修築鐵路的計畫。在計畫中，他為中國精心繪製了一幅雄偉的鐵路建設藍圖，預定修築南路（自南海至天山之南）、中路（自揚子江口達伊犁）和北



一九一二年，孫中山給南洋路礦學校的題詞。

路（自秦皇島達蒙古烏梁海）三條溝通全國的主要鐵路幹線。

一九一二年夏，孫中山還準備到北京去一趟，「以覘人心之趨向」，並爭取他的鐵路建築計畫取得「參議院之贊同，政府之特許」。<sup>11</sup>這時，老奸巨猾的袁世凱為了麻痹革命黨人，鞏固和擴大自己的權力，又再三邀請他北上會商國家的內政綱領。因此，孫中山在八月十八日，自上海乘輪船經天津赴北京。

孫中山同月二十四日抵京後，袁世凱故意隆重地按國家元首的待遇接待，並對他百般地曲意奉承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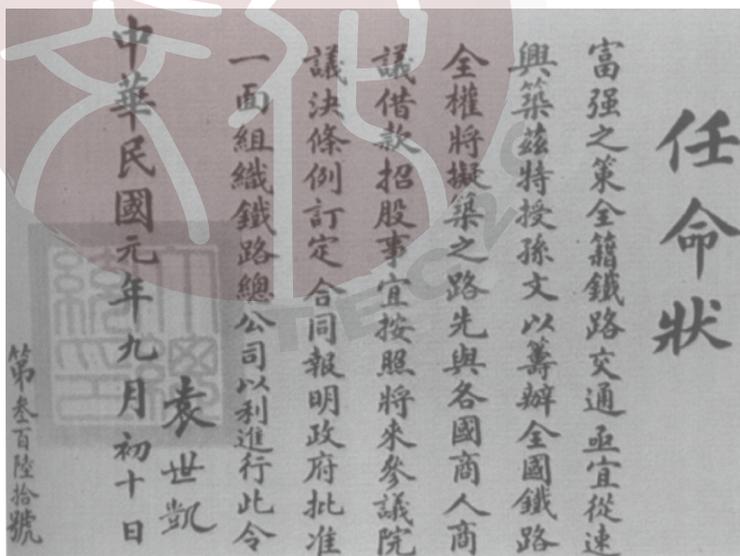


一九一二年五月十七日，孫中山出席商辦粵路公司歡迎會時合影。前排右一為著名鐵路工程師詹天佑，右二為容星橋。

11 《論籌築鐵路事致宋教仁函》，《總理全書》上冊，「函札」，臺北一九五一年版，第三百一十八頁。

推崇，極盡拉攏欺騙之能事。孫中山認為既將政權讓與袁世凱，且「民國大局，此時無論何人執政，皆不能大有設施」，主張「盡可使之負責」。在思想上準備加以支持，也就不再對袁世凱有所警惕。加以袁世凱表面上對他極為尊重，孫中山又缺乏和袁世凱這樣奸詐的人物打交道的經驗，所以很容易為他所欺騙。他與袁世凱剛會談過兩次，就對袁世凱大生好感，並以國家大局為重，立即發電報給上海的黃興，認為對袁世凱「絕無可疑之餘地」，敦促黃興「千萬先來此一行」，以實現南北「統一」。<sup>12</sup>這樣，黃興也在九月十一日來到北京。

孫中山這次在北京逗留將近一個月（二十五天），他同袁世凱晤談了十二次，且多為密談，有時僅有袁世凱的秘書長等一二人



一九一二年，袁世凱給孫中山的任命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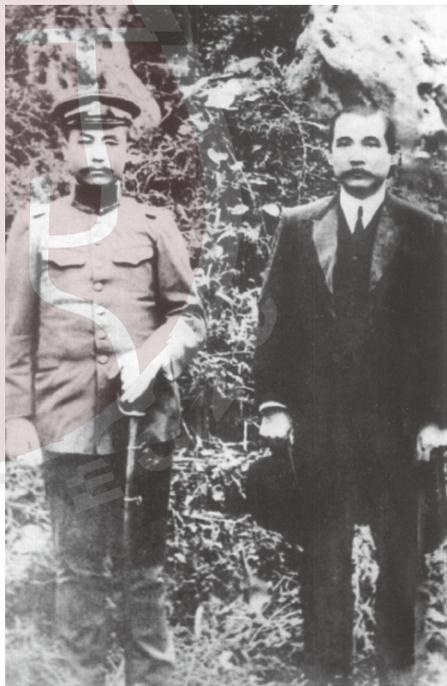
12 《孫中山致黃克強電》，《民立報》，一九一二年九月六日。

座。每次談話自下午四時至晚十時或十二時，有時一直談到次晨兩點鐘。談得非常融洽。所談皆國家大事，包括鐵路、實業、外交、軍事等問題。袁世凱口口聲聲「以國家和人民為念」，對孫中山提出的每一項主張，幾乎無不表示同意。

#### 孫中山對於袁世凱的會談甚

為滿意，被袁滿口「民主」、「共和」的漂亮言詞所迷惑，上了袁世凱甜言蜜語的當，把這個狡猾的大陰謀家誤作好人，完全信賴了他。孫中山甚至天真地對袁世凱表示，支持袁世凱當十年總統，練精兵一百萬，聲明自己辭去正式大總統候選人，不再投身政界，打算「十年不預政治」，「專求在社會上作成一種事業」，即建築鐵路的事業，以增強國力。袁世凱一聽，正中下懷，興奮地高呼：「孫中山先生萬歲！」

孫中山一心為建設國家著想，捨棄了黨派利益，不大過問同盟會的活動。掌握南方革命軍軍權的黃興也認為南北既已統一，沒有必要再保留大批軍隊，便於同年六月自動撤銷自己擔任的南京留守職務，強行遣散南京臨時政府的軍隊，表示誠心擁護袁世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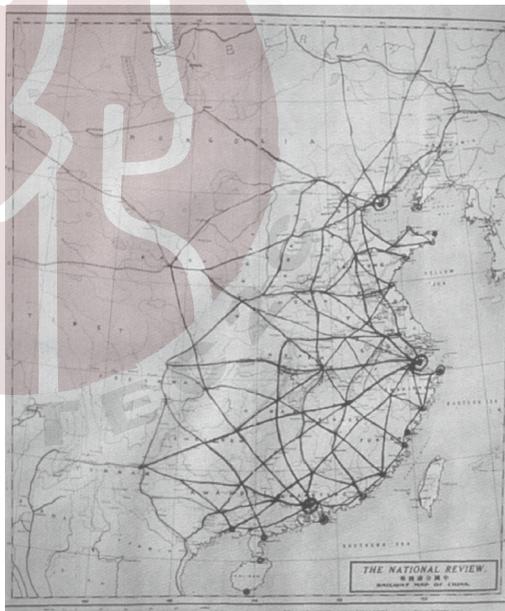


一九一二年九月十九日，孫中山與山西都督閻錫山合影。

隨後，孫中山擔任了全國鐵路協會名譽會長，並在九月初正式接受袁政府授給的「籌畫全國鐵路全權」的任命，立志要在十年內修築二十萬里鐵路，「使中國全境，四通八達」，成為「全球第一強國」。不久，黃興也接受袁政府委任的川粵漢鐵路督辦職務。

孫中山的鐵路建設思想，早在一八九四年的《上李鴻章書》中已見端倪。他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後，將其作為實現民主主義的一部分，曾多次向外界宣講籌畫全國鐵路的必要性及諸多益處。這時孫中山擔任了中華民國鐵道協會會長，又接受了袁世凱授予的督辦全國鐵路的任命，就更加認真地投入了籌建鐵路的工作。他「不敢稍懈」，不辭辛苦地繼續向全國各界宣傳他的修築鐵路主張，並著手籌建組織機構。

為了專門從事社會實業活動，孫中山興致勃勃地先後考察了華北、華中的北寧、津浦和膠濟等鐵路線，完成了全國各地鐵路幹線分佈的設計工作。十月初回到上海，十一月十四日正式成立中國鐵路總公司，又設立了鐵路督辦辦事處，進行統籌安排，並著手籌措經費，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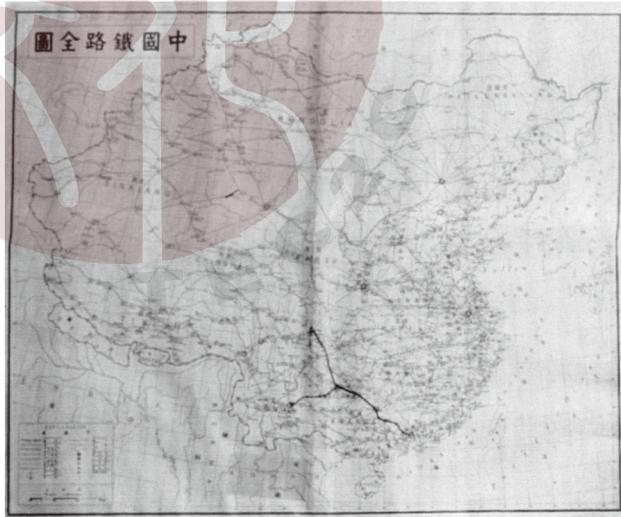


一九一二年，孫中山在上海勾畫的鐵路建設規劃圖。

極進行統籌安排全國鐵路的修建工作。

按照孫中山的設想，籌措資金可採取三種方式：一是與外國訂立合同貸款，自行修築；二是訂立招股章程，成立中外合辦公司，招股修築；三是批給外國人修築，期滿或一定期限後，由我方採取有償或無償方式贖回，收歸國有。同時，特別提出借款要以維護國家主權為前提，規定了三條原則：「一、不失主權，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輕。」<sup>13</sup>他曾就借款和招股工作做過一些努力，但未見成效。孫中山認為，由於我國的資金、人才、技術都很不足，不能不利用外資、外國人才和外國方法，即引進先進技術，所以，以第三種方式最為適宜。<sup>14</sup>可是，他的這種主張得不到輿論的支持，甚至遭到責難。

這期間，孫中山還想依靠西方國家的投資，發展實業，振興中國。為此，他於七月初，



上海鐵路公司懸掛的中國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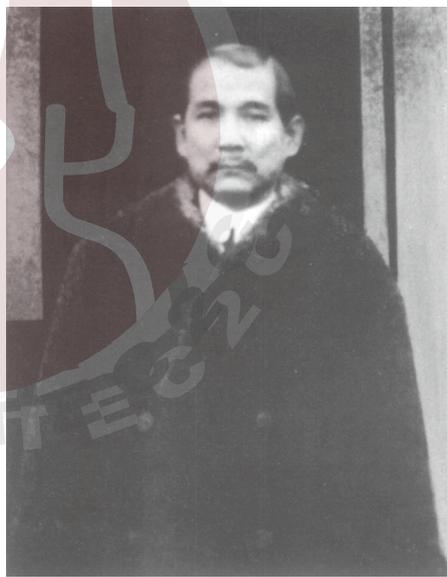
13 《胡漢民自傳》，《革命文獻》第三輯，臺灣一九五五年版，第六十一頁。

14 參見居覺生（居正）：《辛亥札禮梅川日記合刊》，臺灣一九五六年版，第八十、一百〇五頁。

在上海和英國寶林公司簽訂了廣州至重慶鐵路借款合同。除此之外，籌辦鐵路的事業沒有什麼進展。

在一九一二年年底，孫中山在杭州特別歡迎會上，正式提出了「節制資本」一詞。他把「平均地權」、「節制資本」、「鐵路國有」、「教育普及」列為民生主義的「四大綱」。這比同盟會時期又有所前進。在他看來，只要實行這「四大綱」，「我中華民國之國家」，就會「一變而為社會主義之國家」。關於鐵路建設，孫中山大膽地提出：在不損害主權的條件下，借六十億元外債，興建二十萬里的鐵路計畫。當時民初名記者黃遠庸諷刺孫中山是中國「第一個樂天派」。孫中山的確是樂觀的，他說：「今日共和造成，措施自由，產業勃興，蓋可預卜。」他相當樂觀地預期，「凡此所云，將來必有達此期望之日」，那時國強民富，「家給人樂，中國之文明，不止與歐美並駕齊驅而已！」

孫中山是偉大的民主主義者，又是主觀社會主義者，把他的民生主義說成社會主義。他認為，「英美諸國社會革命，或須用武力；而中國社會革命則不需用武力」。中國沒有出現龔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國鐵路總公司在上海開辦。圖為孫中山在總公司事務所前留影。

斷資本家和工人階級尖銳對立，實行「社會革命」要容易得多。孫中山主觀上認為，「一方面國家富強，一方面當防資本家壟斷之流弊」。他認為他的民生主義就是「富強」、「防弊」的政策，又叫做「社會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政策」。他在上海、武漢講演中說：「並非反對資本，只反對資本家而已」，「資本家者，無良心者也」。他一方面表示了對社會主義和貧苦群眾的真摯同情，另一方面又表現出對壟斷資本家的恐懼和仇視。他既要使中國富強起來，又企圖避免歐美那樣激烈的階級對抗和革命，而要預防大資本家的壟斷。

孫中山主張的社會主義，實際上是國家資本主義。他說：「改良今日社會之組織」，「集產社會主義，實為今日惟一之要圖」。「凡屬生利之土地、鐵路收歸國有」，收益歸公，「則大資本大公司盡為公有之社會事業，可免為少數資本家所壟斷專制矣」。在他看來，「國為民國，國有何異於民有」。實行他的民生主義或「社會主義」，中國就變為「社會主義國家」了。

孫中山早在歐美時期曾對各派社會主義學說做過一番苦心研究。辛亥革命時回國，他帶回「歐美最新社會主義名著多種」，要「廣為鼓吹」。解職臨時總統後，他被社會黨聘請為名



孫中山到上海後，住在老朋友兼革命戰友宋嘉樹家中。圖為宋嘉樹。

譽領袖，並應社會黨邀請，在中國資本主義經濟最發達、工人群眾最集中的上海，連續三天演講社會主義各派學說。他高度評價了馬克思的《資本論》，高度評價了「工人者——人類之功臣」，但他仍主張亨利·喬治的單一稅制，認為它是社會主義「精確不磨之論」。孫中山不僅向社會黨，而且向各行各業宣傳民生主義與社會主義。十分有趣的是，他正如列寧說的以「獨特的少女般的天真」，向資本人、商會和中國最反動勢力的代表者袁世凱也宣傳他的民生主義和社會主義。當時，他還不懂得只有在正確的政治改革和土地改革中，盡量發展農民群眾的自動性、堅決性，才能尋找中國更新的途徑。相反，孫中山放棄了革命手段和政治鬥爭，脫離了廣大勞動群眾，幻想與北洋軍閥合作從事經濟建設，「間接使政治基礎臻於完固」。這當然是無法成功的。但是，孫中山在經過革命取得共和制之後，要想從事艱巨的社會經濟改革，尋找中國「復興」的道路，實現中國近代化，卻表現了他忠誠謀國的苦心。孫中山不愧為一個偉大的民主主義革命家，他對苦難大眾的深切同情，對改變中國社會經濟落後面貌的急切心情，對「社會主義」的熱切嚮往，都是可貴的高尚的思想。

孫中山在這一段時間中，為著「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

我們解決農民的痛苦，歸結是要耕者有其田。

—孫中山

孫中山語錄。

。461。

實果革命衛捍處竭精殫  
第一節 致力於建設事業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北京發行的民國郵票。

而到處奔走呼籲，這和他在臨時大總統任上沒有一次談到平均地權、民生主義成鮮明對照。這是孫中山一生宣傳民生主義、社會主義最多的時期，也是他在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後，幻想致力於和平建設的時期。

儘管如此，孫中山毫不氣餒，為了進行民生主義等的宣傳活動，他在短短的半年多的時間裡，周遊了大半個中國，先後到達保定、石家莊、太原、唐山、天津、山海關、濟南、青島、上海、江陰、鎮江、安慶、九江、南昌、蕪湖、杭州、松江等地，不辭辛勞地向各界宣傳自己的築路及國家建設主張。

孫中山致力於國家建設的這些活動，充分反映了他為祖國富強而鬥爭的強烈願望，表現了他對被壓迫、被剝削的勞動人民生活狀況的真摯同情和關懷。在解職後的短短半年多時間裡，他一心一意為「利國富民」而奔走呼號，全力以赴，充分表現出一個革命者不謀私利、不圖名位的高尚品質。當然，由於孫中山對社會政治現實缺乏正確的認識，在政權掌握在反動的袁世凱手中的情況下，他放棄政治，專心致志地從事建設事業的善良願望，不可能得到任何支持，更不可能實現，其結果只能是枉費心機，事與願違，建設美夢瞬間破滅。

從根本上說來，孫中山辭職後專注於經濟建設的做法，是一個錯誤。因為鴉片戰爭以來的歷史已經證明，沒有一個安定的政治局面，沒有一個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的中國，就不能發展工業，不可能有中國的工業化和富強，也就不可能有共和國的鞏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在袁世凱這樣的大買辦、大地主的政治代表控制著政權的情況下，不首先以

革命手段推翻這種反動統治，以為用退讓可以換得一個平靜、安定的環境來發展實業，這必然是一種幻想。孫中山「舍政事，而只專心致志於鐵路之建築」的想法和做法，只能是善良的願望而已。

不過，孫中山的這些努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辛亥革命後中國一度出現的興辦實業的熱潮，是與孫中山的積極提倡和支持分不開的。

## 二、組建國民黨

早在辛亥革命後，同盟會的組織由於妥協和各種遭遇，以及內外敵人的拉攏、瓦解活動，很快走向渙散，並發生了分裂，處於各自為政的狀態。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後，就不大過問同盟會的活動。由於中華民國成立，民主氣氛高漲，「政黨政治」一時成為熱潮。當時作為同盟會實際負責人之一的宋教仁和部分同盟會員也熱衷於實行政黨政治和責任內閣，藉以鉗制袁世凱，在中國實行民主政治。為此，他們徵得黨魁，也就是政黨政治贊同者孫中山和黃興的同意，另組一個公開從事合法活動的新黨，建立政黨內閣。

長期以來，幾乎所有論著中對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間國民黨的組建與活動，都信之不疑地認為與孫中山無關，或說孫中山對這次組黨「並不滿意」，或言他僅是「勉強認諾」而已，對黨事活動並未過問。然而，在對有關史料的整理中，卻發現並非如此。國民黨的組建與孫中山是頗有關係的。它實際上應視作是孫中山一生建黨活動中的一個環節。

這次國民黨從建立到另組中華革命黨，總共存在不足兩年。它在孫中山生平的組黨活動以及整個中國國民黨史中，雖然時間非常短暫，卻也具有不可忽視的地位，既在一些方面反映了孫中山關於建黨的思想，又明顯地暴露了民主革命派領導革命鬥爭的弱點。

孫中山對組建國民黨的態度、認識及領導作用等，究竟如何呢？

首先，組建國民黨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孫中山審時度勢而順潮應勢贊同改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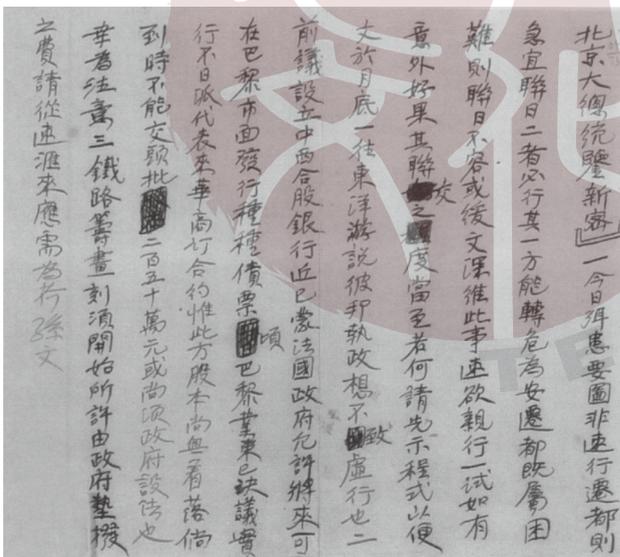
近現代歷史發展中的一個特點，是特定的階級或階層通過組織政黨進行政治鬥爭，即「政黨政治」。辛亥革命爆發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人們普遍認為此後中國也將像西方一樣實行「政黨政治」，因此，各個階級、階層、集團或個人紛紛表態，各種政治思想及主張雜然並陳，興起了一股設會組黨的熱潮，先後成立了各式各樣黨派達三百有餘，其中有明確綱領較為正式者也有三四十個之多。中國社會出現了歷史上僅有的政黨林立的局面。這些政黨的組織者，絕大多數為舊官僚、政客、立憲派或實力派軍人，他們網羅一些同類和同盟會內右翼或失意分子等，表面標榜著為統一中國、建設共和謀取人民福利而立黨，實際上是利用組黨作為達到擁護袁世凱的手段，與同盟會競逐政權。

在這種政黨蜂起的新形勢下，孫中山和他領導的革命黨人，為了鞏固和建設新生的共和國，在一九一二年三月三日對同盟會進行了改組，從一個進行革命（即武裝暴動）的秘密組織改變為從事合法的政治活動的公開「政黨」。

同盟會改組後，由於規定的入會條件極寬，「凡國人已經成年，具普通知識，得為本會會

員」，大批官僚政客、立憲黨人紛紛湧入，雖使組織人數增加不少，但內部思想的混亂和嚴重的分裂情況有增無減，活動上大有江河日下之勢，仍難以適應新的形勢需要。在同年五月一日臨時參議院議長的選舉中，在袁世凱的分化下，偏右的共和黨和統一共和黨達成協議，導致同盟會的候選人張耀曾落選失敗。與此同時，統一黨與民社、國民協進會、民國公會、國民共進會等幾個偏右政黨，由於袁世凱的拉攏，於五月九日組成了共和黨，提出「保持全國統一，採取國家主義」、「以國家權力扶持國民進步」和「以和平實利救國」的口號，竭力擁護袁世凱的「統一」，實際上依附於袁世凱，以對抗同盟會。共和黨在議會擁有相當政治實力，並拉攏統一共和黨人一起，處處對同盟會採取敵視態度，致使同盟會的主張經常遭到阻扼，對其活動和地位構成嚴重威脅。

面對袁世凱專政傾向日趨明朗化以及中間黨派同袁世凱合流的嚴峻形勢，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為了避免「獨裁之弊」，要完成民主共和政治，就必須集結



一九一二年底，孫中山致電袁世凱，告將赴日考察並請速匯鐵路開辦費。

隊伍，重新組合，建立一個較大政黨，通過實行「政黨內閣」，與反動勢力正面抗爭，來維護和鞏固民主共和國。

孫中山解除臨時大總統職務後，一度耽耽在建設祖國的美夢，熱衷於實業，醉心於鐵路建設的籌畫和奔走，而對政治鬥爭沒有寄予應有的關注，對於袁世凱邁向竊國專制和反動勢力日益增強的局勢也缺乏清醒的認識。但是，也並非像後來所說的那樣反對建立國民黨，忽視「政黨政治」的重要和作用，反之，他對政治運動的實際指導，亦是極力主張在中國建立政黨政治的。從他當時宣導和鼓吹「政黨政治」的情形考察，他贊同和支持組建國民黨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孫中山在一九一二年四月至一九一三年三月的一年間，曾就「政黨政治」的種種問題發表了許多言論。

早在一九一二年四月初，孫中山就指出：「當此共和時代。無論政黨民黨，有互相監督、互相扶持之責。政府善則扶持之，不善則推翻之。然現在我民黨之勢力，尚甚薄弱，恐未能達此目的。惟既具此心，不可不互相勉勵，各謀進行，對於今後民國前途，獲益匪淺。」<sup>15</sup>並說：「今日政黨過多，亟謀聯合，鄙人對於自由黨極願商榷政見。」<sup>16</sup>七月間，他又明確提出：「中國和所有國家一樣，不管政府是民主的或是君主的，政黨總是存在的，而且政府的指導權

15 《在上海自由黨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二卷，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版，第三百四十三頁。

16 《在上海自由黨公宴上的演說》，《孫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第四十八頁。

也總是從此一黨轉移到彼一黨的。」孫中山認為：「政黨間的競爭也無可避免，……中國的黨、社已經太多，最好他們能聯合成兩三個有力的大黨。」<sup>17</sup>到國民黨組成後，他更是大講政黨政治，強調「第一應研究者，即為政黨內閣問題」。

孫中山認識到要建立民主共和政治不可以沒有政黨，指出：世界上的民主立憲國或君主立憲國，「無不賴政黨以成立」。「政黨者，所以鞏固國家，即所以代表人民心理，能使國家鞏固，社會安寧。」因此，「今日欲鞏固中華民國，政黨最為緊要」。認為政黨的基礎鞏固，則民國的基礎自然鞏固。他並把「政黨政治」視為不但是革命黨人所應追求的最高政治目標，而且也應該是一個標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所要奉行的唯一的政治制度，說：「是故政黨政治，雖為政治的極則，而在民主權之國，則未有不賴之為惟一之常軌者。」

他針對當時社會上一時掀起的組黨熱潮，提出搞政黨政治，認為兩黨制較多黨制更具有優越性，「一國政黨之興，只宜兩大對峙，不宜小群分立」。因此，同盟會與其他六黨合併，是為了使中國政黨只存「進步、保守」派別，「以便政黨競爭」，認為只有造成兩黨對峙，方利於競爭。

孫中山特別羨慕英、美的政黨制度，稱讚他們的政黨政治是「世界上最完全政黨之國」。他希望中國能「以英、美先進國之（為）模範」，實行兩黨制。在孫中山看來，「天下事非以

17 《在國民黨成立大會上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二卷，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版，第四百〇八頁。

競爭不能進步」，政治也是如此。因此，他贊成政黨間進行政治競爭。視政黨競爭是「絕好之事」，提出「一國之政治，必賴有黨爭（按：即政黨競爭），始有進步。」

如何進行黨爭？孫中山認為黨爭是有條件的，須在政見上爭，不可在意見上爭。即參加黨爭的政黨都必須以國家利益為重，不論「或處於行政地位，或處於監督地位，總以國利民富〔福〕為前提」。他駁斥了黨爭為國家「不祥事」的謬論，指出政黨之爭不同於清朝末年的革命黨、保皇黨視若仇敵的鬥爭，「今各黨之爭，皆維持民國。以民國為前提，以民國為基礎」，是促進國家政治進步的必要手段。此外他還主張建設好的政黨組織，說：「欲求有完全民國，必先有完全議院，必先有完全政黨。」提出要「講求政黨應有之道德，研究政黨應用之方針」等等。

甚至到了「宋案」發生後兩月餘的一九一三年六月，他對日本駐香港總領事今井談話時，還依然提出實行議會政治的主張，說：「現在這時候，國民黨應該做的手段是爭取議會，但選舉大總統的時候比平時比較容易變質的議員多，結果我黨之勝算極少。但袁世凱如果沒有金錢的話什麼也做不到的。而我黨雖然貧乏，但志在千里，最後之勝利歸於我黨。」<sup>18</sup> 如此種種，表明孫中山在這一問題上，儘管認識和推行程度有異，卻和黃興、宋教仁同樣是贊同甚至熱衷於政黨政治的。

這些論述，表明孫中山為使中國逐步進入近代民主政治軌道中所做的努力，它不僅對於民國初年防止和反對袁世凱專制獨裁的實際鬥爭，促進中國政治的進步具有積極意義，而且還為豐富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政黨理論做出了重要貢獻。

孫中山正是基於對政黨內涵和本旨以及政黨政治的認識，並適乎當時客觀形勢的變化，從開始便贊成並支持組建國民黨的。當同盟會為著實現「政黨內閣」改組為國民黨時，孫中山說：「今則共和成立，我同盟會目的已達，並不能再言破壞。凡贊成共和者皆我良友，故須廣為聯合，以鞏固共和；若仍堅持同盟會以前手段，是為守舊。故改組一事，今日為必要之事。」他與多數革命黨人一樣，當時把組建國民黨視作是「時勢所趨，不得不然」，並不存在「勉強認諾」或「並不滿意」的情況。

國民黨的組建，是當時政治形勢的需要，是從事國家建設、鞏固共和制度的需要，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黃興當時對此所講的話是符合實際的：「今所以與各黨合併而改稱國民黨者，蓋將應時勢之要求，為解決建設問題之研究，自然之歸結也。」<sup>19</sup>孫中山正是順應了這種潮流和趨勢。

孫中山是組建國民黨的發起人和支持者。

同盟會組建為國民黨的實際工作，無疑是由宋教仁負責的。當時，孫中山的主要精力正

19 《在國民黨鄂支部歡迎會上的演講》，《黃興集》，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版，第二百八十八頁。

放在他視為「比黨務與政治問題更有興趣」的「實業建國」方面，脫離政治活動，「無暇顧及黨務」，而同盟會本部於四月二十五日遷到北京後，由擔任北京政府農林總長的宋教仁（七月二十一日接替汪精衛任同盟會總務部主任幹事）主持日常工作。宋教仁熱衷於政黨政治，他借此機會聯絡新舊各方，得以對黨事做全面的考慮，因此，領導組建國民黨的任務落到了宋教仁等人的肩上。

宋教仁一直醉心於歐美的議會政治，想通過議會道路在中國建設資產階級共和國。他認為只要組織一個「強大真正之政黨」造成兩大黨對峙的局面，通過參加競選取得參議院的多數席位，建成實行民主政治的內閣，掌握政府的實權，就能夠除去袁世凱的把持權力，將其引向憲政軌道，達到建設獨立富強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目的。因此，他為著組建一個「強大真正之政黨」，全力投入了「縱橫聯合，擴充黨務」的活動，「對於他黨之贊助本會者極力聯絡之」。經過他的奔波聯絡，終於和政見相近的一些小黨派洽商成功，為國民黨的組建工作做了許多事情，實際上也就成為這項工作的主持者。僅就這方面來說，國民黨的成立是由宋教仁促成的，也是符合實際的。但是，孫中山在這次建黨活動中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一）這次建黨的發起人是孫中山。早在國民黨組建前，孫中山、黃興即電告北京同盟會本部宋教仁「提議改組」，「命與他黨合併」；並函電磋商「與他黨謀合併之方」。說明改組一事系孫、黃發起，由孫、黃、宋共同做出決策的。基於這樣的事實，宋教仁當時便在《致各報館書》中聲明：「此次國民黨之合併成立，全出於孫、黃二公之發意，鄙人等不過執行

之。」<sup>20</sup>孫中山在一九一四年另組中華革命黨時，也仍以「國民黨理事長」名義明確宣稱：「新舊兩黨皆文發起。」<sup>21</sup>

(二)從同盟會與他黨合併過程的事實考察，可以窺見孫中山在組建國民黨活動中的關鍵性作用。

同盟會組建政黨之議，始於一九一二年五月間。最早與同盟會商議合併事的是「全國聯合進行會」，是在一九一二年五月中旬。全國聯合進行會以「建設強固有力的中央政府及統一全國」為目的，由於感到其政綱與同盟會相似，遂與同盟會議定合併，除部分成員加入同盟會外，一切會員行動均置於同盟會宗旨、政綱及議決案範圍之內。其時，孫中山在廣州準備北上，他申明赴北京的原因之一，就是進行「調停黨派」之事，說明他是在關注著組建政黨的活動。

組建政黨被正式寫入議程，是七月十六日同盟會本部舉行的全體職員大會。會上，代理總務部主任幹事魏宸組報告擬出的《改定名稱組織完全政黨案》，由於遭到許多人反對，決定提交全體會員大會討論。五天後（即二十一日），同盟會召開夏季大會（全體會員大會）商議了改組政黨，並選舉宋教仁為總務部主任幹事。當時，國內政治風雲日趨緊張，北京出現了內閣風潮，宋教仁等人為掌握議會多數，更加積極聯絡友黨以擴大黨事，他們遂與在臨時參議院擁有多數席位的統一共和黨商議合併事宜。在談判中，統一共和黨提出合併三條件：

20 《民立報》，一九一二年九月十日。

21 《致壩羅同志函》，《孫中山全集》第三卷，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版，第一百四十八頁。

(一) 變更同盟會名義；(二) 廢去民生主義；(三) 改良內部組織。宋教仁「將此三條件征得孫中山及黃興之許可」，然後由同盟會本部政事部主任幹事張耀曾擬出黨名、黨綱及組織草案，於八月五日與統一共和黨（國民黨亦參加）正式談判。七日，三黨代表開會，就黨名、黨綱達成最後協定。他們共同議定：改名國民黨，以「鞏固共和，實行平民政治」為宗旨；黨綱為「保持政治統一、發展地方自治、厲行種族同化、採用民生政策、維持國際和平」五條；採用理事會議制，設理事七人，互選一人為理事長，並擬定孫中山、黃興、岑春煊、蔡鍔、吳景濂、張鳳翽及宋教仁七人為理事。嗣國民共進會和共和實進會願意加入合併，理事人選由七人增至九人，政綱不變。接著，北京同盟會本部於八月十日召開全體職員、評價員聯席會議，聽取宋教仁報告會商經過及合併條件，由於得到同盟會議員集團的廣泛支持，合併組黨問題以與會者絕大多數贊同而通過。宋教仁等立即在當天以同盟會本部名義將通過情況報告給孫中山和黃興，請他們做最後的決定。

孫、黃接到電報後，均明確表示對改組「深為贊成」，並於八月十三日聯名通電同盟會各支部徵求意見：「文等以上列各條（按：指合併條件），與本會宗旨毫不相背，又得此多數政團同心協力，將吾黨素所抱者見諸實行，此非獨同人之幸，亦民國前途之福也。文等深為贊成。……特此通電貴支部，務求同意，以便正式發表。」<sup>22</sup>

八月十一日，宋教仁等合同各黨召開籌備會議，商定了組黨的組織細則等。十三日，以中國同盟會等五黨本部名義發佈了組黨的《國民黨宣言》（稍後全國聯合進行會也加入宣言）。至此合併工作基本完成，專等孫中山來北京主持成立大會。

孫中山於八月十八日離上海乘「平安」輪北上，他途經煙臺時在該地同盟會、社會黨歡迎會上宣佈：「北京同盟會本部歸併五黨，宗旨相同，遂聯絡合併改組為國民黨，以資進行政策」；並強調指出：「此次同盟會與各黨合併，即欲使國中只存二黨，以便政界競爭。」當他二十四日抵京後，翌日國民黨即正式舉行成立大會。這一天，孫中山不顧旅途勞累連續參加了兩個大會。他上午在同盟會本部歡迎會上再次闡述了組建國民黨的目的，號召同盟會員對會外人應本「一視同仁，互相親愛之宗旨，以鞏固中華民國」。下午出席國民黨成立大會，又發表了《解決民生問題》的演說，高度評價國民黨的組建說：「今日合五大政黨為一國民黨，勢力甚為偉大，以之促進民國政治之進行，當有莫大之效果。」並把成立國民黨視為「中華民國富強之嚆矢」，<sup>23</sup>充分肯定了同盟會改組國民黨的積極意義。

稍後，孫中山又進一步讚譽國民黨的組建，認為「其功與南北統一同」。<sup>24</sup>並滿懷喜悅地期望：「同盟會破壞於先，國民黨建設於後，改數千年之舊慣，辟二十四（世）紀之新國，

23 《在國民黨成立大會上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二卷，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版，第四百〇一頁。

24 《在上海國民黨歡迎會上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二卷，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版，第四百八十五頁。

撫今思昔，最快平生。」<sup>25</sup>他還要求黨員應該「以當年經營革命之精神，用溫和和穩健之手段共謀建設民國之事業」。

(三)從國民黨組建後孫中山所給予的實際支持考察，亦表明他是在力所能及地關注著黨的活動。

孫中山與黃興、宋教仁等九人在國民黨成立大會上被選舉為理事，九月三日，黃興、宋教仁等七人推舉孫中山為理事長。孫中山由於一直將注意力放在「從事實業」方面，又一「行止無定」，不能長期留住國民黨本部所在地的北京，不願擔任理事長一職，經過宋教仁等力勸堅留，始行就職。他十五日公開宣稱：「承諸君不棄，又推鄙人為理事長，鄙人即感且慚。因一經任理事長，對於黨中有許多義務，不能不盡。但路事甚為緊要，若雙方並進，誠恐照料不周，推辭至再。後經黨中在職諸君再三強勸，鄙人即不敢再辭。但黨中事務紛繁，非一人力量所能辦，尚望黨中諸君合力擔任。」孫中山在當天晚上，便以理事長身分召集國民黨議員、理事、參議舉行聯席會議，商討北京政府外交總長的人選問題，至深夜始散。十六日，他又召開國民黨理事會，就國民黨的財政問題和對北京政府應採取何種態度等問題，與理事們進行了商議討論。

孫中山在九月十七日離開北京忙於鐵路建設事業後，雖委託宋教仁代理理事長，他自己對

於國民黨事並非「一切不問，純然放任」，也非「僅僅停留在口頭上」的支援，而是依然關注著黨務工作。他在晉、魯等地考察鐵路和礦務結束返抵上海，十月四日立即就黨務工作給北京國民黨本部的領導人發一指示專函，強調指出：「政黨作用，捐棄私人之小嫌，努力國家之要政，不尊一時之大權，而籌百年之安策。甚望諸公以立國之大計畫、立法之大規模，與政務研究會切實討論，發為政策，為議員之後盾，各省之模範，使天下人民知吾黨謀國之深遠，民心向順，共和鞏固矣。」並告知：「華僑同盟會對於本黨改組，共襄贊成」，要求「本部時與通訊，報告一切情況，勿使海外同志與內地相扞格，致生缺望之心，將來於黨中經濟不無補益。」對於國民黨的組建工作，孫中山則或者通過講演、談說要求同盟會改組（如山西等地），或者用函電敦促同盟會改名（如南洋、上海等地），以推動國民黨各地方支部的建立。當上海國民黨交通部由於職員選舉發生問題使組建工作遭阻時，孫中山就「特依三黨（按：指前同盟會、統一共和黨和國民黨）之請，指定辦事人三十員，以謀黨事之進行」，稍後又委任陳其美等為名譽總幹事，楊譜生等為名譽交際幹事，迅速扭轉了籌組僵局，組成了上海國民黨交通部，並積極開展工作，成為了當時黨務活動成績卓著的地區。與此同時，孫中山聞悉國民黨特派員於德坤返黔組黨慘遭殺害，立即一日數電，分致袁世凱和唐繼堯等，要求「徹底根究，公平處決」，表示了國民黨理事長對黨的鬥爭「不能漠視」的聲援。

孫中山在國民黨組建以後的言論，主要是宣傳他的興辦實業這一重要主張，但對國民黨的思想建設也經常發表意見。他認為：「凡一政黨欲求發達，求長久，必須黨員明白黨義，

遵守黨德，不可以用欺騙手段逸出範圍之外。」提出：「政黨出與人爭，有必具之要素：一黨綱，一黨員之行爲正當。」因此，要求在黨爭中注意黨德，明確指出：「政黨之競爭，以道德爲前提，所有政策，一秉公理，然後以之謀國，其國以強，以之謀黨，其黨以昌；若競於勢力之盛衰，則前清政府之勢力，較諸革命黨相去奚翅萬萬，而革命黨卒告成者，公理所在也。」並告誡說：「政黨之爭，在大端而不在細節，……今吾國政爭，淆公私爲一途，不顧輿論，不論是非。其事之出於他黨也，雖至良之策，而反對維力；其事而出於本黨也，雖極惡之政，而擁護維謹。甚至政見不合，波及私交，攻訐讒害，無所不爲，黨德至是，掃地以盡，前之以黨救國者，今乃以黨亡國矣。」<sup>26</sup>他大力號召黨員「此後更當以黨事爲己事，以國事爲己事」。即使出國在日本訪問期間，孫中山也仍然以國民黨理事長身分論述黨務，告誡國民黨人「注意黨綱黨德」。這些意見，對剛剛建成的國民黨的思想建設，必然起著重要的指導作用。

對於國民黨本部的經費，黨員方面僅有「入黨須納入黨員費一元」的規定，收入有限，主要靠領導人和擔任行政主管的國民黨員籌措。孫中山在籌措黨的活動經費方面也煞費苦心，曾多次與戰友等一起籌措設法接濟或者托請他人給予贊助。他一九一二年冬致電黃興說：「近得北京本部消息，存款將盡。弟處將無從爲力，望兄設法接濟，以速進行。」黃覆電云：「弟

處亦無法籌措，仍請密電梁燕孫再撥前款數萬兩接濟。」梁士詒雖系袁世凱的黨羽，卻也是孫中山的同鄉，孫中山前曾利用鄉誼之情請其資助過國民黨經費，這次又電請「轉撥五萬兩交國民黨本部收用」。僅就此來往的電文而論，顯示出了孫中山對國民黨經費問題的關注和支持。

一九一三年初國民黨國會在議員選舉中獨佔鰲頭，獲得重大勝利。孫中山雖在反不反袁的問題上和宋教仁存有頗大差異，卻也感到十分歡欣和興奮，認為「勝利歸於我黨」。他宣佈政見要首先研究政黨內閣問題，要首先研究好憲法，在其足跡所到之處，不論國內或在日本訪問，都極力宣傳「政黨內閣」的主張，實際上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宋教仁角逐政權的政治活動。

當然，上述孫中山的諸項工作和活動，雖說明是支持國民黨，但做的是遠遠不夠的。孫中山在《中國革命史》中總結過去的鬥爭經驗時把「立黨」置於革命事業中犖犖大者之首位，而在作為國民黨的黨魁時期，並沒有認識到將黨事放在壓倒一切的重要地位，給予充分的重視。孫中山後來談到對國民黨的黨事「一切不問」，而是「置身事外」的說法，從他在黨中並未負起實際責任，尤其是對領導政爭這一當時黨務的重點幾乎沒有做什麼工作而言，是符合實際的；若從他的支持國民黨的活動和作用來說，則並非如此。

第三，孫中山一生的建黨活動凡五次。在這五次之中，人們對組建國民黨貶者甚多，尤其對國民黨的黨員成分和黨綱有不少的批評。

孫中山這次所建者，不是「政黨」的政黨，而其他者都是革命黨，不是政黨。國民黨只是為了擴張「黨勢」，爭取多數，不擇手段地廣為吸收黨員和發展地方勢力，來者必納，當時

凡國會議員、內閣人員、各省代表和官員，大都掛名黨籍，而掛名黨籍者都無不在幹事之列。例如，江蘇省區「入黨者旬月之間七八千人」；組織機構方面，本部職員近千人，各地交通部及支部職員從數十人到數百人不等。當時全黨的黨員數目，限於資料難以確知，從「部分資料顯示，有些支部有數千黨員，據此估計，全國應有數十萬人。」這就從形式而言，確實是「範圍日見擴張，勢力固征膨脹」，聲勢十分浩大，並一度成為國會第一大黨。但是，發展黨員「不計品流之純糅」，吸收了一大批官僚政客、立憲黨人等，「齷齪敗類，混跡其間」，使黨的革命精神較比同盟會時代大為減退，甚至造成黨人翻雲覆雨及鬩於牆而不能外禦其侮的惡果，誠然是潛伏著黨的組織解體、革命事業失敗的危機。

在黨的綱領問題上，《國民黨規約》第二條所列五項黨綱，顯然只顧迎合與其他五黨合併的需要而妥協遷就，拋棄了三民主義的革命思想，消除了同盟會秘密時期的「土地國有」的民生主義，削弱了革命性，妥協色彩更加濃厚了，使之與當時其他黨派的綱領並無顯著的區別。這是在當時特定的歷史環境中，當同盟會的勢力日益削弱不聯合他黨難以致勝的情況下，為適應議會鬥爭的形勢而採取的不得已辦法。雖然如此，「國民黨政綱中的『厲行種族同化』屬民族主義，『發展地方自治』屬民權主義，『採用民本政策』屬民生主義，三民主義的輪廓仍歷然可見」。尤其在《國民黨宣言》中對「採用民生主義」的解釋，說明它並沒有真正「廢去民生主義」。這表明國民黨在一定程度上是延續著同盟會的宗旨的。特別是孫中山本人並沒有放棄自己的理想，降低自己的政治綱領，這一時期，他在公眾場合多次宣講民生主義，並夙夜匪

懈地通過辦實業、築鐵路的途徑，要使中國日臻富強，是堅持了原則的。孫中山對國民黨幾次嬗遞所秉持的宗旨主義有個總的估價，他說：「吾黨名稱雖有因革，規則雖有損益，而主義則始終一貫，無或稍改。」<sup>27</sup>事實上，興中會以後包括國民黨的各次改組，都顯示了階段性的歷史意義，都程度不同地承襲著三民主義的宗旨，也都為中國革命做出了大小不一的貢獻。

孫中山在這次建黨中所以積極宣導「政黨政治」，是希望通過政黨政治使中國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這一主觀願望確實是良好的。但是，現實的中國又沒有為這一理論提供政治、社會基礎，並不具備建立政黨政治的主客觀條件。

國民黨躍居優勢的時間極為短暫。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從「宋案」的槍聲中認清了袁世凱反革命的猙獰面目，決定訴之武力，以期先發制人。但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僅是南方的國民黨人，而國民黨作為黨的組織功能並未能發生任何作用，在整個革命過程中也沒有顯現黨的組織力量。這次革命，由於發難地區偏於東南一隅，特別是國民黨內部危機的爆發，在袁世凱的軍事政治雙重壓力下，以討袁為中心的「二次革命」不及兩月以慘敗而告終。孫中山被迫流亡日本。國民黨同年十一月遭袁世凱命令解散。

應該說，組建國民黨是孫中山一生建黨活動中失敗的記錄。孫中山在「二次革命」失敗後，回顧了這段組建國民黨的經歷，經過深刻地反思，他接受了對國民黨缺乏實施有效領導

遭致一敗塗地的教訓，認識到在黨的組織上必須重新下工夫，就決心從整頓黨務入手，「發起重新黨幟，為捲土重來之計」。孫中山說：「我鑒於這個失敗，所以就另行組織中華革命黨，以便實行我們所抱負的主義。」不過，孫中山在總結教訓時把失敗過多地歸於黨的組織渙散和毫無紀律，於組建新黨中採取立誓約、按指印等一系列形式主義的手段，卻又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倒向了民主的反面，給新黨發展帶來重大阻礙，致使其成為了一個狹隘的小團體。這也許是孫中山非始料之所及的。

### 三、建設美夢的破滅

孫中山為實現他的社會改革和經濟建設的理想，於一九一三年二月十一日，作為前總統、「全國鐵路督辦」偕同夫人盧慕貞、英文秘書宋藹齡及隨行人員馬君武、戴季陶、宋嘉樹、何天炯、袁華選等，乘「山城丸」號輪離開上海赴日本，進行訪問考察。



一九一三年二月十四日孫中山等人抵達日本東京。圖為孫中山下火車時的情景。右一宋嘉樹、右三馬君武、右四孫中山。

在日本，孫中山受到「國賓」規模的盛大歡迎和接待。在四十來天的訪問考察中，他先後到過神戶、東京、名古屋、京都、奈良、大阪、福田、熊本等許多城市，參觀考察了工廠、鐵路、學校，並同日本的政治家、企業家、留日學生等進行了廣泛的交流和會談，並擬爭取日本在經濟和技術上給予支持和幫助。他還想依靠西方國家的投資，發展實業，振興中國。為此，又於同年七月初在上海與英國寶林公司簽訂了修築廣州至重慶鐵路的借款合同。

二月十四日，在隨行的日本大阪《每日新聞》社記者與孫中山談到將來還會被選為中國大總統時，孫中山說：「即使我被推選為大總統，也將辭，不就任。較之於就任總統，我更願傾全力



一九一三年三月十四日，孫中山參觀川崎造船所碼頭時的情景。右起：川崎造船所成員四本萬二、孫中山、鄭祝三、何天炯、副社長川崎芳太郎、王守善。

創建伊始之鐵路建設事業。」他還興致勃勃地向這位元日本記者談到了他築造鐵路的計畫：「中華全國之鐵路，應以粵漢為幹線，而使其及早開通，然後及於其他。此乃發展之程式也。」

三月初，孫中山曾專門致電北京政府，請設立鐵道院，以利於所從事的鐵路建設事業。他說：「中國鐵路公司設於上海，系為招資及籌備全國鐵路臨時之設立，刻晤歐亞資本家對於中國二十萬里鐵路，多表同情，自應正式設立機關，以便進行。查歐美各國在交通專署外，設有鐵道院，屬於國務總理，此項機關應迅速籌備以為發展全國經濟之先導。」

孫中山從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情況中，看到中國的未來。他計畫著如何學習日本，並趕超日本、歐美先進國家。



一九一三年三月底，孫中山與黃興等在上海橫濱正金銀行商討興建中日興業公司時合影。前排左起陳錦濤、黃興、孫中山；後排左一三井物產會社上少支店長藤瀨政次郎，左二戴季陶。

當時，孫中山以在野的身分，運用自己個人的影響和號召力，專心致志地投身到建設國家活動中。他要「從事於社會革命」，實現「民生主義」理想，認為「如果不進行社會革命，則大多數人依然得不到生活的快樂和幸福」，「欲謀國利民富，其進行之方針，惟實行提倡民生主義」。他為此重大之事務「正操勞著，出國來到日本，籌辦修築鐵路經費、引進外資發展實業、參觀礦業教育軍工等」，信心百倍的為實現「民生主義」富強民國而奔走。

可是，辛亥革命後同盟會內以宋教仁為代表的穩健派雖然也主張從事建設，但他和孫中山所說的教育和經濟建設不同。他心目中的建設，主要是政治建設，即完善民國的議會民主制度。宋教仁在武昌起義之後，不顧嚴酷的鬥爭環境，急於實施議會民主制度，尤其是責任內閣制。在宋教仁的政治思想中，不具有孫中山那種以軍事專政鞏固新生政權的思想，而是積極主張政黨內閣。他於七月二十一日接替汪精衛出任同盟會總務部主任幹事。由於孫中山、黃興實際上不管黨務，因此，宋教仁負有實際指揮同盟會本部工作的重任。宋教仁認為「同盟會分子複雜，本非政黨組織，前此勉強改為政黨，原非余之本意；且同盟會多有感情用事之舉，尤非政黨所宜出」。因此，他一度打算「另求同志，更組織一黨」。<sup>28</sup>後來，宋教仁雖然沒有離開同盟會，但他一直企圖甩掉黨內的激烈派，改組同盟會，使之放棄武裝革命時的組織方式，適應議會政治的要求，成為從事議會活動的政黨。

宋教仁以為只要通過政黨的合法活動，在國會裡爭取多數，就可以掌握實際權力，就能夠實現民主共和國的方案。他鑒於當時同盟會在參議院中力量的削弱，以及著眼於未來的國會選舉，又一「圖政治手腕制勝，力聯他黨為合組大黨之計」，以便與共和黨從事正常的議會政治競爭，爭取政黨內閣主張的貫徹。為此，他乘在陸徵祥組閣風潮中與統一共和黨形成的政治聯盟，著手與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全國聯合進行會等談判合組大黨事宜。

當時的中國，存在著根深蒂固的封建專制體制，在全無民主經驗和訓練的條件下，並不具備民主制的社會條件。民初的議會民主制度，只是一種彌補政治真空的暫時組合方式。而被評論為「議會迷」的宋教仁卻熱衷於西方議會民主、多黨選舉制度，鼓吹政黨內閣、責任內閣，要在中國實行民主政治。他以為憑藉這個新組建的國民黨，就可以掌握議會多數，就可以和袁世凱爭奪政權。為此，宋教仁在一九一三年初，奔波於長沙、武漢、上海、南京等地，發表演說，批評時政，大力宣傳責任內閣制。他斷然拒絕袁世凱用名利的拉攏和利誘，宣揚將總統改為沒有實權的虛位領袖。宋教仁當時只有三十二歲，年輕氣盛，言辭激烈，全身心地為成立政黨內閣積極準備輿論，是一位年輕有為的政治家。

而袁世凱在竊國以後，進一步投靠帝國主義，並在「民國」這塊招牌的掩護下，日益擴充他的反革命實力，加強反動官僚機構，制定反動法令；又在「統一」的幌子下，實行個人獨裁，打擊革命力量，解散一些地方革命武裝，排擠和鎮壓一些革命黨人。

一九一三年初，第一次國會舉行選舉時，國民黨在眾議院和參議院所得的議席占了絕對的多數，大獲全勝，而袁世凱和幾個御用政黨則遭到慘敗。從而使宋教仁政治前途如日初升，所到之處，歡迎會上無不人山人海。他滿以為可以運用議會多數，制定一部採用內閣制的憲法，自己就可以出任內閣總理，掌握行政實權。

宋教仁一心一意埋頭於議會運動，毫無應變的準備。他一直抱著政黨內閣的理想，希望使民國的政治制度沿著議會民主的軌道完善起來。為了這一目的，他組織了國民黨；也為了這一目的，他效法歐美日本資產階級政客的手腕，周旋於各派政治力量之間，即使是與袁世凱的親信趙秉鈞，他也過從甚密，經常促膝長談。他以為用這種穩健的手段，就可以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宋教仁於一九一二年十月十八日離京南下，一方面回家探望已近十年未見的老母，一方面部署國民黨競選事宜。他雄心勃勃地力爭議會選舉的勝利，以便把政權掌握在自己的手裡。在長沙複選的前夕，他在國民黨湘支部歡迎會上強調指出了國民黨應負的政治責任：「為今之計，須亟組織完善政府，欲政府完善，須有政黨內閣。今國民黨即處此地位，選舉事若得勢力，自然成一國民黨政府。兄弟非小視他黨，因恐他黨不能勝任，故不得不責之國民黨員。」

當各地國民黨議會選舉獲勝的消息不斷傳來，肩負著與袁世凱爭奪政權重任的宋教仁，竟被這種表面的勝利沖昏了頭腦。他得意洋洋地著手部署組織國民黨內閣。他在與湘督譚延闓、湖南民政司長仇鼈的談話中表示，國民黨在議會選舉中已經取得了勝利，政黨責任內閣

制一定可以獲得成功，他約請譚延闓出任新閣內務總長，並請仇鼐出任湖南代理都督。已經參加國民黨的譚延闓當即表示同意。當時，程潛向宋教仁指出，國民黨內部複雜，精神渙散，袁世凱依靠武力，專橫獨裁，「欲實行責任內閣制，不能無疑」。也有人提醒宋教仁要注意安全，但他都並不在意。

一月二十九日，宋教仁自長沙起程赴鄂，準備沿江赴滬，與黃興商量國家大事後轉赴北京。他在湖北除聯絡黎元洪和民社派之外，更安然進行「光天化日之政客競爭」。在漢口嘉賓樓關於中國國家前途和國民黨的演說中，他指出：「自民國成立，迄今二載，縱觀國事，幾無一善狀可述。」公開抨擊了現政府，指責政府財政無計畫，在外交危機中「歌舞太平」。效法歐美，抨擊政敵，為自己的競選製造輿論。對於宋教仁這種不符合中國實際政情的競選活動，在武漢時譚人鳳曾告誡他說：「責任內閣現時難望成功，勸權養晦，無急於覬覦總理。」譚人鳳告訴宋教仁，他獲得秘密報告，會黨頭目應夔丞（即桂馨）在北京直接與政府交涉，領有中央鉅款，要宋注意戒備。然而，宋教仁對這位革命老人的忠告並不在意，他說：「責任內閣實應時勢之必要，未便變其主張也。戒備之說，前在湖南，亦有以此言相勸者，實則蛇影杯弓之事也，請毋慮。」仍然沒有提高警惕。二月十二日，宋教仁離鄂南下，經潯、皖，於十五日抵達上海，又出遊杭、寧。他一路上發表演說，抨擊時政，發揚政見，他把這個假共和的局面看得和真的一樣，竟大模大樣地進行公開的政治競選活動，看不到幕後劍拔弩張的緊張局勢。九江地區密佈的戰爭烏雲也沒有能使他清醒過來。

老奸巨滑的袁世凱密切注視著國民黨的動向，尤其是對於宋教仁。袁世凱並不是依靠議會來和宋教仁爭權，而是採取直截了當的卑鄙辦法，收買一些流氓特務一直跟蹤著他。二月十九日，宋教仁在國民黨上海交通部的歡迎會上發表演說，再次抨擊了袁世凱政府的外交政策和財政政策，指責這個政府是「不良政府」。他表示要延聘醫生來進行挽救，而「延聘醫生之責任，則在吾國民黨也」，重申國民黨決心實施政黨內閣的政治體制，以便保證「將來建設一良好政府，與施行良好政策」。

上海是當時國民黨政治勢力彙集的中心地區，宋教仁在上海的演說，引起了袁世凱方面的特別注意。他們不能再沉默了。袁世凱政府中有人用匿名方式著論批駁宋教仁演說，投稿北京各報，為袁世凱政府辯護。匿名氏公然指責國民黨說：「庫約（指俄蒙協約——引者）問題，實誤於國民黨。臨時政府初成，國民黨人實攬國務，總理以次，多半黨員，凡諸施設，諮而後行。……一年以來，外交關係，悉國民黨中主持。」匿名氏把財政問題的責任也歸咎於南京臨時政府要求鉅款和同盟會以國民捐抵制外債的政策。匿名氏利用同盟會的參政和同盟會成員的複雜成分，來攪混水，要國民黨承擔行政責任。確實，同盟會——國民黨表面上的參政，導致了混淆自己的政治面目的惡果。匿名氏以大地主大買辦階級特有的專橫獨裁思想，猛烈地詆毀宋教仁個人競爭總理的民主權利，他說：「謂與總統有意見乎？吾見其運動內閣，當時媚事總統，惟恐勿至，水乳相溶，已無間隙。謂與現在執政有宿怨乎？吾見其運動內閣，當時款宴訪問，幾無虛夕。鈍初交際能名，轟傳流輩，聲氣相投，已無隔膜。然則其太息痛恨，

力詆狂詈，正自有故……一以發洩舊憤，一以排擠舊人，夫然後目的可償，總理可望。其手段奇，其用心苦矣！」<sup>29</sup>顯然，袁世凱方面對國民黨競爭政權的活動再也不能容忍了。

月暈而風，礎潤而雨。宋教仁本應見微而知著，何況袁世凱方面的種種陰謀詭計，早已露出端倪，但他並沒有覺悟過來，依然在用「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與匿名氏公開論戰。一天，于右任、陳其美、楊思義在宋教仁處聚談，據楊思義回憶，于右任對宋教仁說：「這幾天不再見有匿名氏的反駁了。」宋教仁靠在沙發上，仰天大笑著說：「從此南人不復反矣。」語後，又狂笑不止。陳英士便插嘴說：「鈍初，你不要快活，仔細他們會用暗殺的手段來對付你的。」宋教仁更加狂笑地說：「只有我們革命黨人會暗殺人，哪裡還怕他們來暗殺我們呢？」<sup>30</sup>許多朋友來信告訴他有人尾隨其後企圖行刺，勸他多多注意安全。但宋教仁泰然處之，漫不經心，他認為：「吾意異黨及官僚中人未必有此，此特謠言耳。」



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被袁世凱派人刺殺於上海。圖為宋教仁被刺後的情形。

29 轉引自宋教仁：《答匿名氏駁詞》，《民主報》，一九一三年三月十五日。

30 楊思義：《宋案見聞》，《辛亥革命回憶錄》第八集，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四月版，第五百七十九頁。

然而，毫無信義的敵人，馬上就要動手了。

當時，議會選舉已經基本結束，袁世凱於三月十九日發佈命令，規定四月八日行民國國會開幕禮，議員遂紛紛北上集中。鑒於政局即將更新，袁世凱也多次派人到上海請宋教仁進京商討國事。時值津浦鐵路南北段新近接軌通車，宋教仁正好乘火車應召赴京。三月二十日，宋教仁臨行前興致勃勃至《民立報》社話別。徐血兒鑒於政權決鬥在即，請宋教仁「慎重防衛」。宋教仁心地坦然，自信地說：「無妨。吾此行統一全域，調和南北，正堂堂，何足畏懼，國家之事，雖有危害，仍當並力赴之。」

是日夜十時，宋教仁在國民黨人要人黃興、于右任、廖仲愷陪同下，前往滬寧車站。宋教仁在候車室稍憩後，即前往剪票口準備進站。十時四十分左右，宋教仁走向站口剪票口，車票尚未剪即響起槍聲，他腰部中彈，大喊：「我中槍了，快捉兇手！」這時有三四個人狂奔出逃，其中一個因鞋滑跌倒，旋又躍起，遁入租界不知去向。于右任急忙叫車把宋教仁護送到了附近的鐵路醫院進行搶救。宋教仁自覺傷重難愈，囑黃興代筆，致電袁世凱，望袁世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家得確定不拔之憲法，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延至二十二日凌晨，終因傷重不治逝世。臨終前，他痛苦地感歎說：「我調和南北的苦心，世人諒，死不瞑目矣！」這就是當時震動全國的「宋案」。

宋教仁之死，是一幕歷史的悲劇。但這不是一幕慷慨壯烈的悲劇，而是一幕哀怨淒涼的悲劇。宋教仁之所以陷入這樣一幕悲劇之中，是因為他既要與袁世凱爭奪政權，又不敢於動

用甚至不敢於去認真思索動用革命暴力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因而把勝利的希望單純地寄託在合法的議會運動上，從而陷入了自我麻醉的狀態。

至於中國民主革命中的穩健派的理論思想的錯誤還在於，他們不顧中國社會根本不存在實施議會政治的條件，試圖照搬照抄西方勝利了的資產階級國家的議會民主制度。他們教條式地從議會民主的抽象原理出發，而不顧鬥爭的實際形勢。他們把民國、共和這些紙面上的、徒有其表的東西，當作實際的東西，再從這樣一個錯誤的大前提出發，進行簡單的形式邏輯推理，以此來指導自己的行動，這就使他們不瞭解敵情，分不清敵我。

宋教仁的被害，激起了全國人民的無比憤慨，也促使很多革命黨人從「議會政治」或「實業救國」的幻夢中驚醒過來。孫中山則是最早從建設美夢破滅中破除幻想的一個。當時孫中山在日本的考察訪問已經結束，正準備從長崎回國，在他於三月二十三日即將踏上「天洋」號海輪回國的時候，接到宋教仁被害的電報。他那興奮的面容立即變為悲痛。宋教仁被刺的槍聲，把孫中山從埋頭實業建設的幻想中驚醒過來。他對袁世凱的所作所為非常憤怒，「始幡然悟彼奸人，非恒情可測」，從血的教訓中猛醒過來，徹底認識了袁世凱口蜜腹劍、陰險狡詐的兇惡嘴臉，認為其人「不是個東西」。